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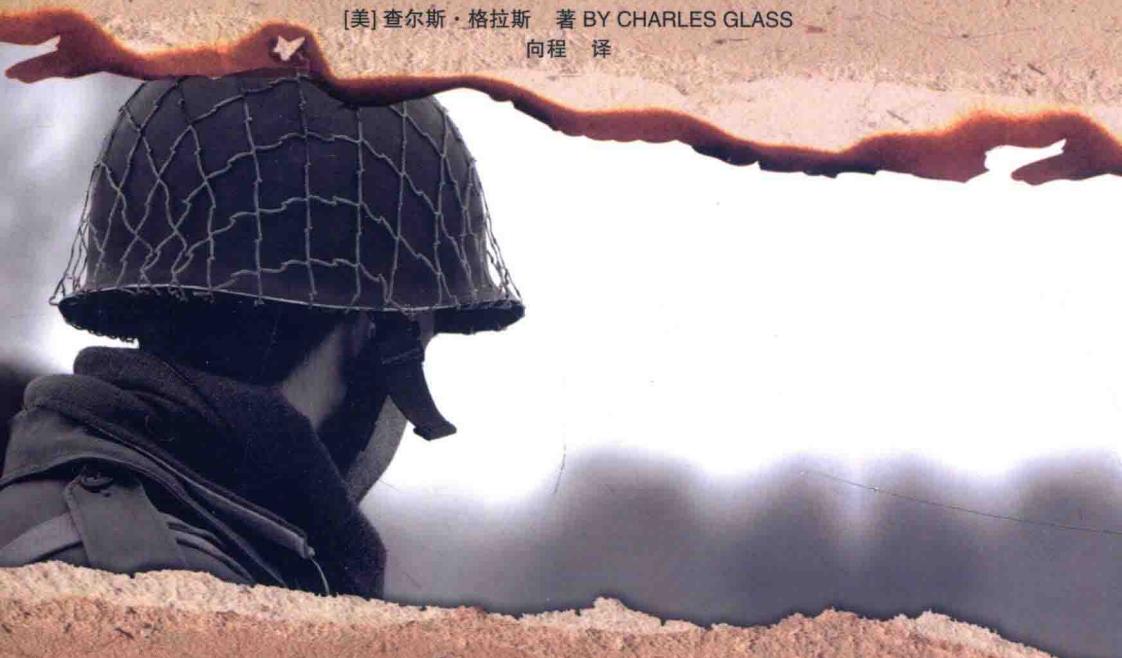
# 战争风云

## 美国士兵战争亲历记

The Deserters  
A Hidden History of World War II

[美] 查尔斯·格拉斯 著 BY CHARLES GLASS

向程 译



# 战争风云

## 美国士兵战争亲历记

The Deserters  
A Hidden History of World War II

[美] 查尔斯·格拉斯 著 BY CHARLES GLASS  
向程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争风云：美国士兵战争亲历记 / (美) 格拉斯著；向程译。--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5.9

ISBN 978-7-5104-5424-0

I. ①战… II. ①格… ②向… III. ①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料

IV. ①K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24851号

## 战争风云

作 者：[美]查尔斯·格拉斯

译 者：向 程

责任编辑：余守斌 熊文霞

责任印制：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发 行 部：(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05 (传真)

总 编 室：(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mailto:frank@nwp.com.cn)

印 刷：北京嘉业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字 数：265 千字 印张：19.5

版 次：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04-5424-0

定 价：3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010) 6899 8638

献给两位朋友，勇敢的美国军人，  
一等兵史蒂芬·J. 韦斯  
和已故的艾尔弗雷德·E. 贝克上校

在二战中，美国政府授予列兵韦斯铜星勋章、三枚战斗之星、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奖章、法国南部登陆战<sup>[1]</sup>嘉奖、战斗步兵徽章和优良品德奖章。法国政府授予他荣誉军团军官勋位、两枚英勇十字勋章、抵抗奖章、战士十字勋章、孚日省<sup>[2]</sup>荣誉市民证书和法国国籍。

贝克上校在越战时期曾是一位功勋卓著的老兵。如宾夕法尼亚州众议院所记录，他因为作战英勇获得银星勋章，还有数枚国防部服役优秀勋章和功绩勋章、三枚铜星勋章、四枚紫星勋章（因为在战斗中英勇负伤），以及多枚服役和功绩奖章。

[1] 法国南部登陆战：即“龙骑兵行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场战役，盟军于1944年8月15日攻入法国南部，作为“霸王行动”的辅攻计划，策应在诺曼底登陆的部队。

[2] 孚日省（Vosges）：在法国东北部的洛林大区。

# 目录

## 序

003

## 第一卷 从男孩到士兵

033

## 第二卷 从士兵到逃兵

145

## 第三卷 军法处置

203

## 后记

277

## 致谢

287

我害怕被人当成懦夫。

奥迪·墨菲，

《百战荣归》（亨利·霍尔特出版社，1949）



# 序



埃迪·斯洛维克认为自己是世上最倒霉的人。二战期间，有近 5 万名美军士兵和 10 万名英军士兵逃离部队，而斯洛维克是唯一被处死的那个。他来自密歇根州的底特律，有犯罪前科，当时 25 岁。1944 年 10 月 9 日，斯洛维克在法国北部逃走，其实并没有代表性。80% 的逃兵都是长期持续作战的前线步兵，而斯洛维克从未参加过战役。他的逃亡经历也与多数逃兵大不相同。他错就错在公然承认自己宁可坐牢，也不愿上战场。斯洛维克最终未能如愿，军事法庭判处他死刑，根据《军法条例》条款所规定的判罚形式，执行枪决。

二战中被判死刑的美军士兵共 49 名，只有斯洛维克的减刑请求遭到驳回。他的审判时逢许特根森林战役<sup>[1]</sup>。斯洛维克所属的第 28 步兵师共有 15000 人，在当年 11 月的战斗中伤亡 6184 人。惨烈的战况迫使军事法庭难以宽大处理。斯洛维克不服死刑判决，于 1945 年 1 月提出上诉。不巧的是，又逢德军开始反攻，发动突出部战役<sup>[2]</sup>，美军陷入生死之战。此刻盟军最高指挥官艾森豪威尔将军若是大发善心，赦免逃兵，绝非明智。

从高级将领之间的书信记录来看，他们都认为有必要处死斯洛维克，

---

[1] 许特根森林战役（The Battle of Hürtgen Forest）：二战期间美军和德军之间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战役，从 1944 年 9 月 19 日，持续到 12 月 16 日，战场在德国和比利时边境以东。

[2] 突出部战役（The Battle of the Bulge）：德军在二战后期发动的反攻，从 1944 年 12 月 16 日到 1945 年 1 月 25 日，在比利时东南、卢森堡北部和法国东北部的阿登森林地区。

以儆效尤。可他们却下令在法国的一个偏远小村圣玛丽欧米讷秘密处死他（背上“懦夫”之名的斯洛维克面对行刑队并没有求饶，还算有点骨气）。这位年轻的逃兵于 1945 年 1 月 31 日上午被枪毙，不管前线战士是否得知这一消息，突出部战役最后还是以盟军的胜利而告终。此后已无须以死刑来震慑士兵，盟军重新发起攻势，并于四个月后推翻了第三帝国。斯洛维克的死刑一直处于保密状态，连他的遗孀安托瓦妮特也未获知实情，她得到的消息是丈夫在欧洲战场阵亡。

1948 年，记者、小说家威廉·布拉德福德·休伊<sup>[1]</sup>发现了斯洛维克的死因，但这件事在当时仍太敏感。他在《自由》杂志上隐藏了斯洛维克的真实身份，称他为“一名 25 岁的美国白人，名叫刘易斯·辛普森，是第 28 师的补充兵”。休伊在文章中提出质问，逃兵有几千名，为何单单处死一人。文章还使人们对美国人的战斗意志产生了怀疑。二战期间，休伊在美国海军服役，他注意到总共有 175 万人经精神病医生批准，以“非身体原因”为由逃避兵役，也就是说每八个参加体检的人中就有一个。经过严格的筛选，有神经衰弱、精神创伤和“战斗疲劳症”（也叫“战斗衰竭症”）的士兵都被视为不适于作战。休伊指出，“二战期间，约有 38000 名军官和士兵因试图以歪门邪道逃避危险任务而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其中军官占 10%。”他们受到的判罚与其参战同袍所经受的苦难相比真的一点儿也不重，只有斯洛维克是个例外。休伊说这件事足以引起众怒，“如果一位身体健康、心理健全的美国士兵在战斗前夜离弃他的战友，他将面临的不但有舒适的监禁环境，还有随之而来的赦免，并且根据《退伍军人权利法案》规定，他还能接受大学教育，试问还有谁会为了祖国浴血奋战？”

他还说：“通过‘排除懦弱的行为’，精神病医生倾向于解除所有美国人参战的个人责任。”但绝大多数士兵还是参战了。太平洋战场上几乎不存在逃兵，即使想逃避危险也无处可躲。在欧洲战场，逃离前线的人不

[1] 威廉·布拉德福德·休伊（William Bradford Huie，1910 年 11 月 13 日 — 1986 年 11 月 20 日）：美国记者、编辑、出版人、电视节目主持人、编剧、演讲家、小说家。

超过总人数的 1%。但这部分逃兵中有 10% 是亲眼目睹过战斗的军官。盟军指挥官讨论过稳定军心的方法。乔治·巴顿将军恨不得枪决这群“胆小鬼”，在他著名的西西里岛掌掴事件中，他扇了一位患炮弹休克症的士兵一耳光，指责他装病。北非和意大利战场的英军高级指挥官恳求政府恢复一战中处死逃兵的做法。有的指挥官赞成前线救助站不仅要有传统的医疗救护手段，还要配备精神病医生，这一观点很受欢迎。他们意识到精神和肉体一样也会受到创伤——士兵每天都要面对死亡的威胁，忍受空中轰炸和密集炮火造成的脑震荡，地雷和诡雷带来的恐惧，营养不良，恶劣的卫生条件和睡眠不足。要让崩溃的士兵振作精神重返战场，为他们提供精神辅导、像样的食物、干净的衣服和充足的休息，可能比行刑队的威胁有用得多。

逃兵中没几个是懦夫。无间断地与轴心国敌军战斗，很多人是在持续作战的高压之下精神崩溃。盟军前线部队的轮换体系存在缺陷，迫使士兵超出自己所能承受的极限。下级军官训练不过关，带兵无方，很多军官自己不参与战斗，也没能鼓舞军队的士气，就把青年士兵赶上每天炮火纷飞的第一线。每个逃兵率高的连、营、师都受指挥不利和补给不足的影响，指挥官和逃兵一样应该受到指责。战后的研究表明，盟军在补充兵力时将单个士兵杂乱地分配到各个连队，这样就打乱了互相熟悉和信任的小团体，使得各个小分队缺乏凝聚力。小分队的其他战友都阵亡之后，继续战斗只有死路一条，有的士兵就会选择逃亡。

前线的其他战士最能与逃兵产生共鸣。有时他们自己也有退出战争的冲动，他们只需逃离部队，或者朝自己的脚上开一枪，或者不听前进的号令故意掉队就可以了。如果战友要离队，极少有步兵会试图阻拦。

1954 年，休伊的书《处决列兵斯洛维克》出版问世，该书通过翔实的调查，将埃迪·斯洛维克的真实身份公之于众。20 年后，马丁·辛在同名的电视电影中饰演斯洛维克。影片中马丁·辛念了一段斯洛维克临刑前的真实遗言，他说：“他们处死我，不是因为我逃离部队，这样做的人有千万个。他只不过要杀一个典型，杀我是因为我有前科。我小时候偷过东

西，就因为这个他们要杀我，就因为我 12 岁时偷过面包和口香糖。”

上一次有人因逃离部队而被处死还是在 1865 年，一个叫威廉·斯米茨的士兵被联邦军行刑队枪决，他隶属于宾夕法尼亚志愿军第 90 团 F 连。在那之后，埃迪·斯洛维克是第一个。（南北战争中，从南军和北军中出逃的士兵超过 30 万人。作家马克·吐温更以当过双方的逃兵而闻名。）从 1865 年到 1945 年这段时间里，也出过很多逃兵。南北战争过后，边防部队军心涣散，逃兵现象仍然常见。军饷太少，食物太糟，还得忍受军官的虐待，士兵毫无顾忌地逃离部队，奔往待遇更好、薪水更高的金矿、银矿和牧场。在与北美土著的战争以及美西战争中，美军没有一个逃兵遭受处决。一战期间，共有 24 名逃兵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结果后来全被伍德罗·威尔逊总统赦免。

如果说斯洛维克是美军中最倒霉的逃兵，那么韦恩·鲍尔斯可能是最走运的一个。鲍尔斯在登陆日<sup>[1]</sup>之后第三天到达法国，那年他才 23 岁，是一名军用卡车司机。1944 年 11 月，他在法国北部靠近比利时边界的蒙多里尼<sup>[2]</sup>小村遇见了黑头发的法国姑娘伊薇特·贝勒兹。鲍尔斯生于密苏里州的奇利科西，不会说法语，伊薇特不懂英语。后来《法兰西晚报》上是这样写的：“经历了数月的奋战，鲍尔斯看到了伊薇特的嫣然一笑。”就在突出部战役的前几天，鲍尔斯往比利时边境运送补给，半路上他的卡车被劫走了（很可能是逃兵干的）。他孤身一人徒步而行，实在找不到自己的小分队，于是他逃回了伊薇特身边。他没法跟伊薇特结婚，因为绝不能让警察知道他的存在。他躲在贝勒兹一家的房子里，而伊薇特在附近的纺织厂上班。他俩生了五个孩子，从来不准孩子告诉别人他们的父亲是谁。后来二战结束了，朝鲜战争打响。接着朝鲜战争也结束，鲍尔斯曾经的顶头上司艾森豪威尔将军当选美国总统。这些年来，鲍尔斯始终是个通缉犯。美国宪兵和法国宪兵来伊

[1] 登陆日（D-Day）：诺曼底登陆战役发生的日子，在 1944 年 6 月 6 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在欧洲西线战场发起的一场大规模攻势。

[2] 蒙多里尼（Mont d'Origny）：位于法国东北部皮卡第大区的埃纳省。

薇特家搜查过两次，都没发现鲍尔斯在楼梯下面的藏身之处。

休伊的书把斯洛维克案推上风口浪尖，直到四年后，韦恩·鲍尔斯的名字才见诸报端。1958年3月，贝勒兹一家的房子外出了一起车祸，屋里的鲍尔斯不该隔着窗帘往外窥视。他这一看，刚好被调查现场的警察发现，他被移交给美国宪兵。这对年轻恋人的爱情故事被各大报纸竞相报道，短短三天之内美国驻法大使馆就收到了6万封来信——都是为鲍尔斯求情的信，请求宽大处理这位爱上法国姑娘的美国青年。军事法庭宣判鲍尔斯犯有逃离部队罪，判处他服10年劳役，不过很快就改判为6个月劳役。美国军法署复查过鲍尔斯的案子后决定将其释放。两年后，鲍尔斯和伊薇特在蒙多里尼完婚，那时他俩的第六个孩子刚诞生不久。

讲故事的人没有将斯洛维克和鲍尔斯与大规模逃离部队这一宏观现象联系起来。美军和英军的逃兵有15万人之多，其中绝大多数人的结局既不同于斯洛维克，也不同于鲍尔斯。斯洛维克是唯一被处死的一个，而鲍尔斯是少数几个处罚极轻的逃兵。二战逃兵真正的故事在这两类之外，还有一些士兵的命运更具代表性，并且鲜为人知。找到他们，是我的首要任务。

伦敦的一次偶遇给了我意外惊喜，帮我指明了方向。那是2009年的3月，为了推广我的上一本书《美国人在巴黎：纳粹占领下的生与死》<sup>[1]</sup>，我来到了伦敦的“前线俱乐部”，这是一个战地记者的集会场所。听众里有一位谦和有礼、穿着体面的美国绅士问我几个问题。所有演讲者都怕遇到他这样的人：熟知演讲主题的听众。他对法国抵抗运动的了解显然要比我更详尽。他的胸前别着一朵玫瑰形的徽章，一点也不张扬，但可以证明他是法国荣誉军团的一员。原来他曾属于美国的正规军，还加入过1944年的法国抵抗组织。

后来我们移步南肯辛顿，在他家附近找了个喝咖啡的地方，他给我讲述了抵抗军的故事，听得我不亦乐乎。最后他问我接下来打算忙些什么。

[1] *Americans in Paris: Life and Death Under Nazi Occupation*, 国内并未引进，《美国人在巴黎：纳粹占领下的生与死》是译者的暂译名。

我告诉他我要写一本书，讲述二战中美军和英军逃兵的故事，又问他是否知道些什么。他回答说：“我就是个逃兵。”

我们又各点了一杯咖啡，从那天起我有了一位新朋友——史蒂夫·韦斯<sup>[1]</sup>，美军第36步兵师功勋卓著的老兵，法国抵抗军的一员，同时也是一名逃兵。

直到那时，我的研究才从档案馆转向图书馆，从军事法庭的记录转向老旧的缩印邮件<sup>[2]</sup>资料，从泛黄的文档转向浩如烟海的学术研究。史蒂夫·韦斯给战争和逃兵困境这两个题材注入了新的活力。他心胸宽广，接受了数小时的访谈，还给我看了他的私人藏品，包括一本未出版的回忆录、大量的书信、报刊文章、照片和书籍。我们一起去了法国东部，重访他曾战斗过的地方，在森林里找到了他和战友从前挖的散兵坑。我经常缠着他问问题，而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如实回答。他生于1925年，如今仍保持着健朗的体魄和饱满的热情，跟1942年加入艾森豪威尔远征军的那个青年别无二致。

随着我对韦斯的了解加深，我对他的尊敬和崇拜也与日俱增。战争结束后，他的人生成为一次漫长的探索，揭示了战斗、军纪、监禁如何影响他和他的战友。长年接受精神病治疗让他自己也成了一名精神病医生，他的亲身经历使他能与治疗对象产生共鸣。他的病人有着与他相似的精神创伤，有些人的状况比他严重得多。有的老兵把往事埋在心底，韦斯却选择直面痛苦。他领着我重游战场，去看那些见证了他胜利和屈辱的地方。他还带我寻访了他的老战友。到了晚年，韦斯从加利福利亚搬到伦敦，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著名的战争研究系授课。

查尔斯·B.麦克唐纳在他的《齐格菲防线战役》<sup>[3]</sup>中写道：“为困境中

[1] 即史蒂芬·J.韦斯，史蒂夫是史蒂芬的昵称。

[2]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军将邮件先用显微软片摄影，再运输到海外，放大之后印出，交给收信人。

[3] The Siegfried Line Campaign，国内也并未引进，《齐格菲防线战役》是暂译名。齐格菲防线是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前，在其西部边境地区构筑的对抗法国马奇诺防线的筑垒体系。1944年和1945年盟军和德军在此处进行了激烈而持久的攻防战。

的美军士兵写书立传总让我受益颇多，就跟记录美军光荣凯旋一样意义非凡。”查尔斯是一名步兵上尉，1944年和1945年期间在北欧作战。二战中的步兵是战斗主力，他们的巨大不幸也非常人可以想象。登陆意大利和法国海岸的大多数士兵没能活着见证二战胜利，而有的幸存者得知德国投降的消息时正因逃离部队而身陷囹圄。他们知道自己无法撤出前线，面对危险得不到丝毫喘息，在坟墓和耻辱之间只好选择后者。很多士兵甚至连选择的机会都没有。身体仿佛不听使唤，领着他们避开危险，他们回忆起逃离的情形，仿佛是在做梦一般。很多人胆怯了，很多人崩溃了，很多人实在忍受不了了。战地记者厄尼·派尔写道：“不管长得多壮，战场上究竟有没有人能够防止自己精神崩溃。我看这是个谜。”他的报道以同情普通士兵而闻名。

少数人逃离战场是为了谋财，他们偷走前线战友赖以生存的军用物资拿去卖。1944年到1946年期间，那不勒斯、罗马、巴黎的黑市贸易都由盟军逃兵所掌控。他们劫掠盟军的运输队，常常是武装抢劫。当乔治·巴顿将军的坦克部队正要突破德军的齐格菲防线时，他们劫走了军队的汽油。逃兵无休止的劫掠使他们战斗在前线的同袍缺乏食物、毛毯、弹药等必需品。在意大利，逃兵开着卡车，把抢来的盟军装备运给意裔美国黑手党成员维多·吉诺维斯<sup>[1]</sup>（他隐瞒了自己的法西斯背景，通过手段成为了在那不勒斯的盟军将领不可或缺的人物）。臭名昭著的“莱恩帮”就由逃兵组成。1944年，宪兵几乎全年都在追捕该组织的成员。该组织的头目叫沃纳·施迈德尔，是一名23岁的列兵，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阿伦敦，化名为罗伯特·莱恩。他的帮派抢劫、勒索、谋杀，无恶不作，一度让军队和民众陷入恐慌。1944年11月，宪兵将他们抓捕归案，可他们在平安夜发动了一次胆大包天的越狱行动，逃出去后向罗马的黑社会寻求庇护。几周后施迈德尔和帮派的核心骨干再次被捕，并于1945年6月因犯谋杀罪而

[1] 维多·吉诺维斯（Vito Genovese，1897年11月27日—1969年2月14日）：绰号唐·维多（Don Vito），生于意大利那不勒斯，是美国著名黑手党帮派分子。

被处以绞刑。但此事并未终结，逃兵的犯罪活动此起彼伏，一直持续到战后。（在头目被绞死的一周以后，两名莱恩帮残余分子在从罗马到佛罗伦萨的路上劫持了一辆武装运钞车，车上装有 133000 美元现金。）在法国，美军逃兵与科西嘉岛的犯罪组织勾结起来，盗窃香烟、威士忌酒、汽油等其他货物，并参与销赃。美军逃兵在法国肆无忌惮地强奸、抢劫，在法国民众眼里，他们的暴行比德军在占领法国的四年里的“正确表现”好不到哪去。

巴黎有太多诱惑，尤其是漂亮女人和不义之财，都在向美英士兵招手，引诱他们逃离部队。有个叫艾尔弗雷德·T·怀特黑德的中士，本是个田纳西州的农场小伙，因为在诺曼底登陆战中的英勇表现获得银星勋章和铜星勋章。巴黎解放后，他摇身一变成为当地一霸。他与一位餐馆女服务员同居，抢劫盟军补给站、餐馆和普通民众。他代表了一类逃兵，法国媒体称他们为“芝加哥帮”卖命。跟那些躲起来的逃兵相比，他们更让盟军指挥官头疼。《纽约时报》的记者达纳·亚当斯·施密特写道：“美军逃兵光天化日之下在公路上劫持卡车，与美国宪兵交火。”他在巴黎的另一篇报道中说：“如果不跟宪兵合作，法国警方不敢介入。”抓捕逃兵成了大多数同盟国宪兵的全职工作。

战争初期，英国和美国军方明白有士兵会因为高度紧张的战斗而精神崩溃。这种事在一战中见得多了，“炮弹休克”这一术语也是从那时起开始普遍使用。老派思想认为不论是“炮弹休克”还是后来改称的“战斗疲劳症”都不过是给“怯懦”换了个新潮的说法罢了。但是一战以来的心理学研究发现，人的心理和身体一样，也会受伤。为了弄清哪些人容易崩溃，哪些人承受力强，当时有大量的研究。哈佛大学的埃德温·加里格斯·波林教授带领最顶尖的心理学家，与军方合作出版了一本《战士心理学》。这本书为每个参战的士兵而写，指导他们如何在战斗中保全心智，很快就卖了 380000 册。书中有很多真知灼见，尤其是对于不堪高压精神崩溃的普通士兵，此书郑重地指出：“他们不是懦夫。”

恐惧和精神崩溃让史蒂夫·韦斯逃离部队，贪欲驱使艾尔·怀特黑德<sup>[1]</sup>走上邪路，此外还有另一种逃兵，他们逃走纯粹出于对杀戮的厌恶。《战士心理学》指出对于成长在和平年代的孩子来说，战争和杀戮不是什么正常的活动，书中写道：“美国人对打打杀杀没有特别的爱好。他们通常厌恶杀戮——认为杀人是错的、有罪的，杀人就要偿命。”这种观念不只美国人有。有一名叫约翰·弗农·贝恩的英军士兵出逃过三次。他从未在战斗过程中逃走，事实上他在北非和法国北部的表现都很不错。在诺曼底，英军的军事法庭总共审判了逃离战场的4名军官和7018名士兵，而贝恩却在战役中坚守阵地。他逃避的不是战争，而是军队。在他看来，军队是个灭绝人性的组织，所提倡的行为放到除战争以外的任何情况下都是犯罪。为了保全自己的人性，他选择了逃亡。贝恩的经历一定能让心存疑惑的士兵产生共鸣，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在崩溃或者逃亡之前还能坚持多久。贝恩生前留下了不少书信、笔记和访谈记录，他的儿子约翰又提供了大量的细节作为补充，使我们能更深入地了解贝恩的品性、动机和缺陷。

约翰·贝恩以逃兵的口吻给他的儿子写了首诗：

但是孩子，内心深处，我的灵魂，  
仍旧完美无瑕；  
他们以为捏死我就像捏死一只虫子，  
可到头来我才是赢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像有些电影和冒险故事里描述的那样精彩。经历过的年轻人感到身心俱疲，逃离战场，也没什么好奇怪的。约翰·基根最早记录下亲历者眼中的战争，他写道：“战争没有任何精彩可言，尤其是二战，它造成了5000万人死亡，毁灭了欧洲大片的文化遗产，引发了政治腐败，动摇了明文的道德基础。”

[1] 即艾尔弗雷德·T·怀特黑德，艾尔是艾尔弗雷德的昵称。

